

王荆文公詩箋註

下



NLIC 2970670003



王制及下等書註

一

〔宋〕王安石 著
〔宋〕李壁 箋注
高克勤 點校

王荆文公詩箋



NLIC 2970670003

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

前 言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他不僅以其文學成就彪炳千秋，而且更以其政治革新的劇烈和思想學說的創新而影響當時。王安石首先是作爲一位政治家、思想家而出現在北宋的歷史舞臺上。他曾兩任執政，倡導變法，權傾天下，在當時的地位及對後世的影響都是歷代文人難以望其項背的；也正因如此，他在生前和身後都受到了大相徑庭的評價。九個多世紀以來，人們對他的政績聚訟紛紜，爭論不休；但是，對於作爲一位文學家的王安石及其傑出的文學成就，却幾乎是衆口一詞地給予了高度評價。

王安石，字介甫，晚號半山，封荆國公，撫州臨川（今屬江西）人，生於宋真宗天禧五年（一一〇二），卒於宋哲宗元祐元年（一一〇八六）。他從事政治、學術和文學創作的年代，主要在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也正是北宋王朝開始陷於積貧積弱境地的時候。當時，宋朝開國已近百年。自從結束了五代十國分裂割據的混亂局面之後，宋朝潛在的內外矛盾便開始暴露。國內，官僚隊伍臃腫腐敗，軍隊驕橫而缺乏戰鬥力，土地兼併越來越嚴重，這一切加重了人民的苦難，導致社會矛盾日趨激化。同時，宋朝還面臨着遼和西夏兩個少數民族政權的侵擾。宋朝每年要向遼、西夏輸納大量銀絹作爲「歲

幣」，以換得邊陲的暫時安定。作爲一個政治家，王安石從青年時代踏上仕途開始，就把自己的一生同宋王朝的命運密切地聯繫在一起。執政之後，他更是把全部精力傾注在政治活動之中，其進退也隨着他倡導的變法運動的發展而變化。有意味的是，當新法被推翻時，王安石也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幾乎沒有一個文學家像王安石那樣，與政治的關係如此密切。

王安石步入仕途之際，正值「慶曆新政」實行之時。以范仲淹等爲代表的革新派，爲了緩和北宋王朝面臨的危機，在宋仁宗的支持下改革弊政，史稱「慶曆新政」。雖然這次改革由於遭到保守派的反對，不到一年就告失敗，但是改革思潮仍在繼續發展，對於改革的内容和方法等問題的認識也逐步深化，改革已成爲社會的普遍要求。青年王安石深受改革思潮的影響，並與范仲淹、歐陽修等改革派領袖交往。當時的王安石，勤於學習，敏於政事。從慶曆二年（一〇四二）中進士起，到至和元年（一〇五四）入京爲官前，他轉宦州縣，先後擔任過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職務。在地方官任上，他力圖有所作爲。如在鄞縣任上，他「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宋史本傳）。十餘年的地方官生活，鍛煉了王安石的才幹，爲他贏得了聲譽，也爲他後來執政時推行新法積累了經驗。

王安石的詩文創作也是從這一時期發軔的。在四十多年的創作生涯中，他創作了一千五百餘首詩、三百餘篇文，以及大量的學術著作和內外應制文等。在北宋文壇上，王安石的創作數量是名列前茅的，內容也是極其豐富的。作爲以政治家立命的王安石，耻以文士自名，其文學思想也表現出政治

家的色彩，宗旨在於經世致用，重道崇經。他強調「文章合用世」（送董傳），「務爲有補於世而已矣」（上人書），把文學的內容囿於「禮教治政」的範圍，但並不輕視藝術形式，主張「文貴自得」（同前），以盡言其志。因此，王安石的詩文創作實踐，雖然與他的文學主張之間存在有不盡相符之處，但總的說來還是後者的具體表現。其顯著特點是，題材和數量隨着政治活動的發展變化而呈現出相應的發展變化。這一特點在他發軔期的詩文創作中就得到了顯明的體現。這一時期，他開始了詩文創作，其中散文創作相當活躍，其二十餘篇記敘文的大半都作於這一時期。揭露現實黑暗，抨擊弊政，關心國事，要求改革，是王安石這一時期詩文的重要內容，反映了他對現實生活的觀察和思考。同時，他這一時期的詩文，也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藝術風格。其記敘文偏於議論，敘事簡略，文字樸素，說理透闢，風格顯得峭直而又簡潔。

從至和二年（一〇五五）入京爲群牧判官起，至嘉祐八年（一〇六三）因母喪離京丁憂訖，其間除了嘉祐二年（一〇五七）由群牧判官出知常州，嘉祐三年（一〇五八）調爲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外，王安石一直在京爲官。中央和地方的宦宦生活，使他對當時社會的經濟、政治狀況有了更深入廣泛的瞭解，同時也使他十多年來關於改革的思考更爲成熟清晰。嘉祐三年冬，他寫成了一篇長達萬言的雄文，這就是次年入京所獻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書中提出了一整套改革方案，表明王安石已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改革思想。王安石的改革方案雖然未能爲宋仁宗所採納，却使他在北宋政壇上嶄露頭角。這一時期，是王安石詩歌創作的豐收期，其詩在內容上仍然保持前一時期那種密切聯繫現實、充滿改

革要求的特點，在藝術風格上則有了顯著的發展。他這時期的詩，在體裁上從前一時期的多爲古體，轉變爲古體、近體詩創作並駕齊驅；風格上也從直陳其意、惟意所向，開始漸趨含蓄，往往用比較平婉、含蓄的表達代替純然以議論爲詩，描寫亦更趨精細。這一時期的散文創作則相對不够活躍，但仍保持了前一時期說理周詳、議論風生的特點而又有所發展。

嘉祐八年（一〇六三）秋，王安石因母喪回江寧。治平二年（一〇六五）服闋後，他因病未能赴京應召，遂在江寧設幄講學。通過講學，王安石宣傳了他的改革思想，並在周圍聚集了一批青年知識分子，形成以他爲代表的新學學派，爲後來推行新法準備了輿論與人才。治平四年（一〇六七）正月，年僅二十歲的青年皇帝神宗即位。他銳意進取，起用王安石，先是任命他知江寧府，不久便召他人京爲翰林學士，由此揭開了熙寧變法的帷幕。在這四年的居喪講學時期，王安石的詩文創作都不甚活躍，但却不乏可取之作。其近體詩更注重對偶和用典，詩藝顯得更爲純熟。他這時期的散文主要是一些書信和幾篇學記，內容主要是討論學術，宣傳改革，議論色彩更趨強烈，寫作上善於引經據典，依經立論，風格上由峭刻拗折漸趨平婉溫醇。值得一提的是，王安石這時還嘗試詞的創作，著名的咏史詞桂枝香金陵懷古就作於此時。

從治平四年（一〇六七）秋入京爲翰林學士起，至熙寧九年（一〇七六）第二次辭相回江寧訖，是王安石在北宋政壇上大顯身手的時期。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從經濟、政治、軍事和教育科舉制度幾方面，開始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熙寧二年（一〇六九），他被任命爲參知政事（副宰相），次年拜

相。從此，王安石處於北宋王朝的權力中心，傾注全部精力於變法運動之中。因此，他這一時期的詩文創作雖不甚活躍，而內容則和變法運動密切關聯，反映了變法運動的進程，表現了王安石在急劇變動的政治風雲中的複雜感情。

從熙寧十年（一〇七七）回到江寧起，至元祐元年（一〇八六）逝世爲止，這十年王安石一直在鍾山過着隱居生活。由於脫離了繁重的政治活動，王安石這時專力於詩歌創作，詩詞數量也以這時期爲最多；但散文創作日見減少，主要是一些序文和書信。由於新法的推行遭受挫折，以及愛子王雱的早夭，脫離政壇的王安石對世事開始產生一種超然的態度，思想也發生了一些顯著變化。這一時期，他由早年的「以佛濟儒」，即從佛教經典中吸取可以爲儒家學說所利用的觀點，轉變爲試圖向佛教尋求解脫，創作了不少充滿釋氏說教意味的詩文，帶有虛無的色彩，反映了他這一時期的思想變化。然而，作爲一個曾經執著於世事的政治家，王安石畢竟未能全然遺世獨立，他雖過着隱居生活，但仍心憂國事。在隱居生活的初期，他還繼續修訂三經新義，撰寫字說，爲新法提供理論根據。對政治的關注，一直貫穿到他生命的結束。值得一提的是，王安石這時的詩風出現了引人注目的變化。他更注重藝術推敲，講究修辭技巧，重視詩的韻味，創作了大量雅麗精絕、脫去流俗的小詩，詩風已從充滿「連雄峭直之氣」（梁啓超 王安石傳）變爲表現「深婉不迫之趣」（葉夢得 石林詩話），對後代詩人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王安石的文學成就主要表現在詩文創作方面。其詩題材廣泛，體裁多樣，藝術上達到了很高的成就。從題材上來說，有現實題材、歷史題材，也有咏物詩和大量的田園風景詩。其中，現實題材和

歷史題材的詩，是王安石詩中最富於政治色彩的部分，突出地表現了其詩議論風生的特點。他的現實詩中，固然不乏如河北民、感事一類描寫生動、語言質樸之作，但更多的是如兼併省兵一類以文爲詩、不甚注意修辭的作品。這些作品多作於前期。相比之下，他的咏史詩的藝術成就似略高一籌。其咏史詩通過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評述，總結歷史經驗，努力還歷史人物的本來面目。尤可稱許的是一些咏史絕句，議論精警，獨具隻眼。他的咏物詩中，也有不少託物言志、借物議論之作，寫得頗有情趣。王安石的田園風景詩，多數是他晚年的作品，是其詩中藝術成就較高的部分。他的這類詩，善於體察大自然的細微變化，細緻地描繪出大自然的美麗景色，還善於將一己融入大自然之中，達到人與自然和諧的境界。

王安石的詩，從體裁上來看，各體皆工，尤以古體詩和絕句成就更高，集中地表現出長於議論和精於修辭的特點。王安石的古體詩學韓愈，以七言古詩爲主，以文爲詩，風格奇崛，表現爲一方面以古文的章法、句法入詩，另一方面以古文中常見的議論入詩，以形象的語言發表議論，以議論的方法補充形象。以文爲詩的長處在於增強詩歌的表現能力，獲得渾灑古茂的藝術效果；而其失誤在於將以文爲詩推之極端，一味以議論行之，毫無形象可言，則詩成了押韻之文。王安石詩的精於修辭主要表現爲對偶和用典，以及善用比喻、借代等修辭手法，這一特點在他大量的律詩和絕句中表現得尤爲充分。用典和對偶是我國古典詩歌的傳統手法，可以增強詩歌的表現深度，具有一種含蓄的美和韻律的美。王安石詩在用典和對偶方面作了大量的探索和努力，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有時也失之於

用典過甚，和一味追求工整而不顧及詩的內容，這同樣也會影響詩的表現力。

王安石詩取得的成就，固然是他在藝術道路上努力探索的結果，也是和他在藝術上轉益多師、博采衆長分不開的。其詩初學杜甫、韓愈，晚年潛心於此，更力摹陶淵明、謝靈運和王維之詩。同時，王安石的詩，也是北宋自梅堯臣、歐陽修等開始確立到蘇軾、黃庭堅等完成的「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滄浪詩話)的宋詩風格這一進程中的重要一環。王安石的詩，在以杜甫爲學習的楷模和講究修辭技巧（主要是用典和化用前人詩句）這兩方面，尤其給黃庭堅及江西派詩人以很大影響。誠如梁啟超所說：「荆公之詩，實導江西派之先河，而開有宋一代之風氣。」(王安石評傳)

王安石的散文創作較之其詩影響更大。他的散文在寫作上同樣有着多方面的特色，不僅體裁多樣，題材廣泛，而且結構謹嚴，析理透闢，語言簡潔，筆力雄捷，風格鮮明而有變化，由峭直剛勁漸趨深婉溫醇。

此外，王安石的詞作雖然數量不多，但却值得一提，所謂「瘦削雅素，一洗五代舊習」(劉熙載藝概詞曲概)。其詞不僅在內容上擴大了詞的傳統題材，其咏史懷古詞、農村詞、禪理詞都爲後人開了先河；而且還豐富了詞的表現手法，如以詩爲詞，將詩中常用的用典等手法用於詞中，並且以議論入詞，做了不少獨創性的努力，從而突破五代以來詞爲艷科的樊籬，在詞史上贏得了一席之地。

王安石一生著述繁富，其內容涵蓋經學、史學、文學、佛學等方面。由於北宋末年的黨派之爭，以及後世的毀譽之論，其著作散佚頗夥。

王安石的詩文集有兩個版本系統，一是臨川先生文集，一是王文公文集。王安石詩文，其生前未及結集。宋徽宗重和元年（一一一八），薛昂等承詔編集王安石遺文，是爲王集有刊本之始，惜未傳世。南渡後，杭州、龍舒、臨川、麻沙等地都有刻本。紹興十年（一一四〇），撫州知州詹大和刻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詹本原刻不傳。紹興二十一年（一一五一），王安石曾孫王珪在杭州刻臨川王先生文集，今有北京圖書館藏本。明嘉靖年間，臨川知縣應雲鸞據詹本翻刻，爲明清兩代王集的通行本。應本與王珪本大致相同，僅數首詩編次略異。一九五九年一月，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出版的臨川先生文集，即用明嘉靖三十九年（一二六〇）撫州覆紹興十年詹大和刊本爲底本，並用鐵琴銅劍樓舊藏宋紹興刊本、繆氏小岵山館刊本，及清綺齋本、王荆文公詩箋注、嘉業堂本、沈欽韓、王荆文公詩文集注、宋文鑒、宋詩紀事、四庫全書考證等校勘，校語附記在每卷之末。該本還將日本漢學家島田翰以日本宮內省圖書寮藏殘宋本王文公文集取校今本所得佚詩佚文，和陸心源、朱孝臧、唐圭璋諸家所輯王氏詩、文、詞佚篇，編爲臨川集補遺一卷附於卷末。是爲迄今爲止臨川先生文集版本系統的最佳整理本。

王文公文集爲現存王安石文集的最早刊行本。清末，日本宮內省圖書寮發現此書的宋槧本。一九六二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用江安傅氏從食舊德齋原藏本（現藏上海博物館）攝存玻璃片影印，缺卷以北京圖書館藏日本宮內省圖書寮藏本照片補足。趙萬里先生撰有宋龍舒本王文公文集題記，於此書的版本源流等情況敘述頗詳。書中避宋高宗、趙構諱。又，王珪本跋文稱「比年龍舒版行，

尚循舊本」。皆可證龍舒在紹興年間刻過王集，而且時間先於王珣本。此本與臨川先生文集一樣同爲百卷，但編次迥異，並互有缺漏。此本先文後詩，與臨川先生文集編次正相反。此本古詩部分五、七言古詩，律詩部分各體律詩和絕句，都雜廁在一起。目錄和正文題目有不一致的情況。而臨川先生文集則經過一番加工，整齊劃一，不少詩巧立名目，不如龍舒本尚存舊題。龍舒本缺後者所收詩一八〇餘篇；而後者亦缺龍舒本中所收詩七十二首，此七十二首詩又見於南宋李壁的王荆文公詩箋注中。兩本文章互相缺漏者亦有數十篇之多。兩本對勘，除篇題和字句間的異文層見疊出之外，兩本脫文可互爲校補，兩本佚篇亦可互爲補輯。相較之下，龍舒本重出舛亂較多，其中重出詩達十七首；又誤收一些他人詩作。一九七四年七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唐武標校的王文公文集。

除上述兩個版本系統的王安石詩文集外，王安石詩集尚有宋人李壁箋注的王荆文公詩箋注，是現存宋人詩注中富有史料價值的一種。李壁（一一五九—一二二二），字季章，號雁湖，眉州丹稜（今屬四川）人，爲南宋著名史學家、續資治通鑑長編的作者李燾之子。南宋開禧三年（一一〇七）至嘉定二年（一二〇九），李壁謫居撫州（今屬江西）。撫州是王安石的故鄉。李壁在撫州，因愛好王安石之詩，遂核對版本，訪閱墨迹，搜尋石刻，爲之作箋注，由其門人李西美於嘉定七年（一二二四）刊行，是爲王荆文公詩箋注（以下簡稱李注）一書。是書向以注釋詳備，重視石刻、墨迹等實物資料，以及輯佚補遺了王安石的不少詩文等特點，爲學林所推重。四庫全書總目稱其「大致摭摭蒐採，具有根據。疑則闕之，非穿鑿附會者比」。李壁此書出後，元大德五年（一三〇二），劉辰翁將此書評點、刪略，由門人王常予以刊

行。劉辰翁刪略的目的在於使注釋簡明，但有的地方刪略過甚，致使一些注文上下不連貫，違失原意，尤其是不少注文出處被刪，難以檢索。元刊本今北京圖書館有藏本。以後明清刊行之本皆出於此。其中最著名者為張宗松於清乾隆六年（一七四一）重刊的清綺齋本，後由其裔孫張元濟影印。一九五八年，中華書局出版的汪東先生整理本（以下簡稱「通行本」），即以此為底本。一九八四年秋，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王水照先生應日本東京大學文學部邀請，赴日本講學，在日本名古屋市蓬左文庫發現一部南宋李壁箋注、劉辰翁評點的王荆文公詩箋注（朝鮮活字本，以下簡稱「蓬左本」）。經核對研究，發現該本不僅附載有宋人詹大和撰王荆文公年譜，而且注詩較為詳細，注文較通行本多出一倍左右，並附有「補注」和「庚寅增注」兩個部分（關於該本的版本研究及注釋特點，詳見王水照先生為該書影印本撰寫的前言及補記，已收入本書，此處不贅）。其實，通行本也保留了「補注」和「增注」的部分內容。有的已與李壁注合刊於注文中，如卷九和王微之登高齊補注「發揮春秋名玉杯」條、卷十六平甫歸飲「補注」識字「真未博」條等。有的在卷末另列，如卷二十七卷末專列「補注」和「增注」，「補注」部分除蓬左本的三條注外，還有卷中刪略的李壁注數條，而「增注」部分內容全同蓬左本「庚寅增注」，只是省略了「庚寅」二字而已。卷二十八卷末、卷三十五卷末等亦如此，「增注」部分內容亦全同蓬左本「庚寅增注」。但也有不一致者，如通行本卷四十六卷末所列的「補注」，是被刪略的內容，而「增注」兩條注文，則全同蓬左本的「補注」。在王水照先生之前，日本京都大學博士高津孝先生對該本作了精密的調查研究，撰寫了關於蓬左文庫本王荆文公詩箋注，發表於日本東方學第六十九輯，並以此榮獲日本第四屆（一九八五）東方

學會賞」。鑒於該本的學術價值，王水照先生遂將其書複印携回國內，並交上海古籍出版社以王荆文公詩李壁注之名於一九九三年影印出版。一九九一年，臺北故宮博物院入藏王荆文公詩李壁注宋刻殘本（目錄三卷、正文十七卷）。已有學者將此本與蓬左本等對勘，發表研究文章。由於整理者未有獲讀此本的機會，所以無法參校。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有關論文。

此次整理，即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之王荆文公詩李壁注（朝鮮活字本）為底本，參校明嘉靖應雲鸞刻臨川先生文集（以下簡稱「嘉靖本」）、宋龍舒本王文公文集（以下簡稱「龍舒本」）、清綺齋本（以下簡稱「清綺齋本」）。由於「蓬左本」錯訛甚多，為省篇幅，遇明顯錯字徑行改正，不出校記。注中引文除佛道兩典外，多據出處之通行版本予以校核，為保持原貌，除明顯錯訛脫漏外，一般不作更改；同時，避諱字、異體字也多予保留，不作統一。目錄不出校記，校改內容參見正文校記。在整理過程中，參考並吸取了清沈欽韓王荆公詩集李壁注勘誤補正（收入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五九年編輯出版之王荆公詩文沈氏注，以下簡稱「沈注」）、汪東和唐武等先生的部分標校成果，為省篇幅，書中亦未一一標明，謹此一併致謝。限於學力和條件，本書的整理工作一定存在着不足和闕誤之處，敬請讀者指正。

高克勤

二〇一〇年五月於上海

記蓬左文庫所藏王荆文公詩李壁注（朝鮮活字本）*

南宋李壁箋注的王荆文公詩和施元之、顧禧、施宿合編的注東坡先生詩是公認的兩部重要宋代詩歌箋注本，前人所謂「李氏之注」王詩，猶施氏之注「蘇詩」（清張宗松語），却遭到了同樣的厄運：前者被南宋末劉辰翁所刪節，後者被清人邵長蘅等人所刪改，而其原本或沉晦難覓，或殘缺不全，引起不少版本學者的扼腕太息。一九八四年秋，我在日本名古屋市蓬左文庫得見這部朝鮮活字本王荆文公詩李壁注（注），即與通行本對勘，發現注文多出一倍左右，且附有「補注」和「庚寅增注」，保存了宋刻李注本的原貌，對研究王安石詩歌及宋代文學和歷史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至於施、顧注蘇詩，今存四部殘本，在日本和我國台灣學者近年來努力的基礎上，再加上我在日本搜集到的一些新資料，也可基本復原了。長期缺憾，得以彌補，忭喜何似！

* 本文為王荆文公詩李壁注（據朝鮮活字本影印）之前言，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十二月，曾先刊

載於文獻一九九二年第一期。

〔注〕本書書名歷來著錄有小異。宋刊本大都作王荆文公詩注，如郡齋讀書志附志作王荆公詩注、藏園叢書經眼錄作王荆文公詩注、嚴元照書宋版王荆文公詩注殘卷後（庚午）等。元刊本作王荆文公詩箋注。張元濟影印本作王荆文公詩李雁湖箋注。蓬左本扉頁無正式書名，今擬名王荆文公詩李箋注，取其簡明醒豁。

一、李壁注本的評介

李壁（一一五九——一二二二），字季章，號雁湖，又號石林，諡文懿，眉州丹稜人（今四川丹稜）。宋卷三百九十八有傳。寧宗時官至參知政事，後又兼知樞密院事。開禧三年（一二〇七）至嘉定二年（一二〇九），他謫居撫州期間，「嗜公（王安石）之詩，遇與意會，往往隨筆疏於其下。涉日既久，命史纂輯，固已粲然盈編」（魏了翁本書序），遂完成此書。

李壁是南宋著名史家李燾的第六子。宋史本傳說他「嗜學如飢渴，羣經百氏搜抉靡遺，於典章制度尤綜練」。與父燾、弟聖著名於世，蜀人比之「三蘇」。生平著述甚豐，達八百餘卷。他又沉浸王詩，用力頗劬。劉克莊後村詩話續集卷四評云：「雁湖注半山詩甚精確。其絕句有絕似半山者，已采入詩選矣（指中興絕句續選）。」真德秀也說他的詩作，「知詩者謂不減文公」（故資政殿學士李公神道碑，真西山文集卷四十一）。都可說明他對王安石詩歌藝術的學習和傾倒。

李壁的學力和所用的工力，使本書見稱藝林，頗得好評。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五三評云：「大致拮據蒐採，具有根據，非穿鑿附會者比。」張宗松重刊王荆公詩箋注序以此書與通行臨川集對勘，發現「篇目既多寡不同，題字亦增損互異，乃嘆是書之善，不獨援據該洽，可號王氏功臣也」。大致說來，本書有以下幾個優點：一是注釋詳備。從典故、詞語出處、所涉人物、作詩背景乃至詩句含義等五個方面詳加箋注和探索。這點為學界所共許，連專門替李注「勘誤補正」的沈欽韓也嘆其「贍博」。二是重視實物資料。李壁不僅網羅異本，詳勘詩句文字的異同，而且重視當時尚存的墨本、石刻。尤為可貴的，他所見的墨本、石刻，常有序跋，為理解王詩提供了切實可靠的依據。如卷三白鶴吟示覺海元公詩，李壁親於臨川得此詩石刻本，有跋於後，謂詩中以白鶴、紅鶴、長松，分喻覺海、行詳、普覺三僧，而王士禛池北偶談卷十四「王介甫詩」條，却以白鶴喻爭新法者，紅鶴喻呂惠卿之流，對照之下，其附會穿鑿，至為顯然。三是輯佚補遺。本書所收王詩比通行臨川先生文集多出七十二首，這已為許多學者所指明，具體篇名見張宗松重刊王荆公詩箋注略例。其實，在注文中還有一些王安石佚的詩文。如卷三十九初去臨川題下注引王安石再宿金峰詩，卷四十六書陳祁兄弟屋壁注引王安石與陳君東文（此文蔡上翔王荆公年譜考略卷四誤為張宗松「補注」所引，張實未作「補注」），皆為本集失收。李注常引王安石同時人或後人詩以注王詩，其中也不乏宋人佚詩。翁方綱借抄宋本李雁湖注王荆文公詩足本喜而有賦六首之四「自注」已指出：「雁湖注中附詩，屬樊榭宋詩紀事頗有失者。」

但由於王安石詩歌取資宏富，交游廣泛，足蹟又遍布半個中國，李壁漏注誤注之處亦復不少。不